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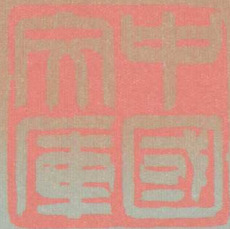
中国文库

· 文学类 ·

穆旦诗文集

(一)

穆旦著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库

文学类

穆旦诗文集

(一)

诗

穆旦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穆旦诗文集/穆旦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9
(中国文库)

ISBN 978-7-02-006322-2

I. 穆… II. 穆…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3298 号

责任编辑:岳洪治

整体设计:翁涌 李梅

责任印制:董文权

穆旦诗文集

Mu Dan Shiwenji

穆旦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25.375

字数:506 千字 印数:1—4500

ISBN 978-7-02-006322-2

定价:45.00 元(全二册)

“中国文库”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友先 邬书林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从军 李东生
杨牧之 宋木文 张小影 柳斌杰 徐惟诚 龚心瀚

主 任：聂震宁

副主任：刘伯根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之江 王 琦 王瑞书 边彦军 吕建华 刘玉山 刘国辉
刘健屏 李 岩 李保平 李 峰 杨 才 杨 耕 杨德炎
吴江江 吴希曾 吴尚之 吴 斌 何林夏 汪继祥 宋一夫
宋焕起 张伟民 张 琦 陈 鹏 胡守文 俞晓群 祝君波
贺圣遂 贺耀敏 栾世禄 黄书元 曹 铁 龚 莉 惠西平
程大利 焦国瑛 解 伟 薛炎文

“中国文库”第三辑 会员委员会

回 函

(收信函请寄北京)

主任：刘伯根 副主任：刘国辉 宋焕起
成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殿利 刘晓东 李红强 汪家明 林 阳
徐 俊 潘凯雄

出版编务组：

李红强 仵永成 蔡增裕 谢仲礼 乔先彪
全冠军

“中国文库”第三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刘伯根

副主任：刘国辉 宋焕起

成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殿利 刘晓东 李红强 汪家明 林 阳

徐 俊 潘凯雄

出版编务组：

李红强 仵永成 蔡增裕 谢仲礼 乔先彪

全冠军

穆旦(查良铮)诗文集编委会
顾问委员会

名誉顾问

巴 金

顾问

杜运燮

周与良

辛 笛

唐 湜

郑 敏

袁可嘉

杨宪益

巫宁坤

杨 苡

邵燕祥

李 方

刘玉山

编选

李 方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 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永恒的思念(代序)

周与良

岁月流逝,往事如烟,良铮已去世二十年。过去广大读者只知道他是一位优秀诗歌翻译家,最近几年他写的诗才被承认,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作为诗人的亲人,我十分欣慰。但是,那段悲痛的记忆一直留在心头。他去世了两年多,通过家属申请平反,才得到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79年8月3日),上面简单地写道:“根据党的有关政策规定,查良铮的历史身份不应以反革命论处,故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又隔一年,1980年7月16日中共南开大学委员会复查决定查良铮同志问题已“于1956年10月根据本人交待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予以结论”、“撤销由高教六级、副教授降为行政十八级的决定,恢复副教授职称”,“在降级时期内的工资不再补发”等。1981年11月27日南开大学党委在天津市烈士陵园召开平反大会。1985年5月28日,骨灰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墓碑上写着:“诗人穆旦之墓”。人们会说现已为他平反,他的译诗都已出版,也出了诗集,并对他的诗歌评价很高,可以无愧地说那已是过去的事。可是,活着的亲人想起他一生的经历,不免永远悲怆,心灵上的创伤永远很难很难愈合。

二

我和良铮是1946年在清华园相识的。当时我二哥珏良是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每逢周末我经常去二哥家玩，良铮是二哥的同学，他也常去。周末清华园工字厅有舞会，我经常参加，有时良铮也去。1946年夏，我去参加国民党政府官费留学考试，考场设在北师大，又遇见良铮。王佐良、周珏良也都参加考试，我们大家在北师大附近小馆吃午餐。那时我吃得很少，良铮风趣地说，“你吃得这么少，这么瘦，怎么能考好呢？还是胖了会更好。”他是二哥的同学，我也没在意。后来，他由沈阳回北京，常去燕京大学找我，有时我和其他朋友在一起，他很礼貌地离开；有时第二天去了，我又有事，在燕京园姊妹楼会客厅里谈几句，他就走了，我很抱歉。周末我常去市内叔父家，有时他约我在米市大街女青年会见面。我们经常去女青年会客厅聊聊天，王府井大街逛逛。他爱逛书店，也陪我逛东安市场，有时买几本书送我，有时也看电影。寒暑假我回天津，他也来天津看我。那时父亲经常去唐山，在家里常开舞会，兄弟姐妹的同学朋友常去，良铮也是其中的一位。我们初相识，他常问我爱看小说吗，我说中学时看过许多，巴金、茅盾的小说，还有武侠小说，因为我读的那所学校，从小学三年级就读英语，中学时也看过几本英文小说如《小妇人》、《傲慢与偏见》、《战争与和平》等。他说真看了不少书，那为什么读生物系。我说我喜欢理科，看小说只是消遣。会面时他常给我讲游记或一些趣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立人）的生平。后来我们比较熟了，他才谈到，他怎样从缅甸野人山九死一生到了印度，又回到昆明。他曾向我介绍他的家庭情况，我感觉他对母亲非常孝顺，对姐妹感情很深，

责任心强,只是看上去沉默寡言,不易接近,相处久了,感觉他很热情,能体贴人。有一次他忽然向我要一张相片,他说要给母亲看。我说没有。他说去照一张。我有些不高兴,我想我认识好几位哥哥们的同学,人家都没有要相片。不过去美国以前,我还是送给他一张相片。当时良铮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讲话有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写诗很有见解,人也漂亮。

当时国民党政府公费留学名额很少,大多考生都改为自费留学生,可向政府购买官价外汇,比黑市要便宜好多。本来良铮打算和我一同赴美留学,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父母和妹妹都需要他赡养帮助,他不仅要筹款购买外汇,还必须留一笔安家费,因而他在1947年冬去上海、南京找工作。1948年3月,我由上海坐“高登将军号”邮轮出国。良铮从南京来送行,一直送我上船,还送了我几本书和一张相片,相片反面写着:

“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

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

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

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

这张相片是八十年代从“文革”后退回的杂物中找到的。良铮随联合国粮农组织去泰国曼谷后,我每周都收到他的信。信的内容非常有意思,有时描写泰国的风土人情,有时也谈泰国的经济。他说生活很容易,不用太累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只是天气太热,待路费赚够,就去美国。他还寄我很多他在泰国各地照的相片,这些信我一直保留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我才烧掉。这些信,增进了我们的感情和相互了解。

良铮1949年8月抵美。在旧金山遇到珏良二哥回国,他把身边的几十美元托二哥带回北京给他母亲。他本来打算去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就读。当时他更喜欢哥大。在芝加哥停留一周,就去了纽约。他动员我转学哥大,我因刚读完硕士学位,准备博士生的资格考试,不愿意换学校。他去纽约只呆了三天,又回到芝加哥,在芝大英国文学系就读。他住在靠地铁附近的一家小旅店,房间很小,共用卫生设备,房租很便宜。他每天吃炼乳,面包,花生酱,有时也买碎牛肉罐头,水果吃最便宜的桔子、葡萄等,当时一毛多钱一斤。

1949年12月,我们坐火车,去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城结婚。当时我五哥杲良在那里一个研究所做博士后。结婚仪式很简单。在市政厅登记。证婚人是杲良和另一位心理学教授。我穿的是中国带去的旗袍,良铮穿的是一套棕色西服。一般正式场合都要穿藏青色,他不肯花钱买,就凑合穿着这套已有的西服。杲良订了一个结婚蛋糕。参加仪式的还有几位他的同事。我们住在大西洋岸边的一个小旅馆一周,然后返回芝城。

婚后我们和一位芝大同学合住一套公寓房间。来往的朋友很多,每周末都有聚会,打桥牌、舞会等。陈省身先生是芝大数学系教授,我们常去他家,陪他打桥牌,然后吃一顿美餐。那时我很爱玩,良铮从不干涉。几十年我们共同生活,各自干自己喜爱的事,各自有自己的朋友。在美国读书时,良铮除了读英国文学方面的课程,还选了俄国文学课程,每天背俄语单词。我们生活并不富裕,但如果同学有困难,他总竭力帮助。他待人以诚,大家都喜欢他。我们的家总是那么热闹。八十年代,我去美国探亲,遇到几位老同学说,“你们在芝大时是最热闹的时期,你们走了,大家都散了,也不经常聚会了。”

1950年春天,原抗日远征军的将领罗又伦夫妇忽然来芝加哥访问,我们共同参观了芝大校园,芝城博物馆,美术馆等。那时我和良铮非常喜欢印象派画,芝加哥美术馆有很多印象派画

家的画。良铮最喜欢荷兰画家梵高的画。这位画家一生坎坷，他活着时想用他的画换一杯啤酒，都没有人肯换。我们还去参观了芝加哥一个屠宰场(全美最大的)，在中国餐馆共进午餐。良铮和罗又伦谈得最多的是中外诗歌，并建议他多看些古诗，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等。罗的情绪不高，正在美国旅游，准备回台湾，罗只说了一句“欢迎你们随时回台湾”。在回家的路上，良铮对我说：“在中国打了败仗，军人不吃香。”以后再也没有罗的消息了。

在美国读书，多数人完全靠半工半读维持生活。一般实验室都没有助教，所有工作都由研究生干，每周干多少小时，由自己决定。由于生活问题，一般至少每周干二十小时，晚间也可以去干。在获得博士学位前，我在芝大新成立的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研究所干活。那是个新成立的所，除了几位教授，下面具体做实验的人员很少，他们非常欢迎我去工作。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由于准备回国，临时干，每周可拿到二百元工资(当时在实验室干活，每小时一元)，那里教授非常喜欢我，愿意我留下。良铮不找工作，只是在邮局干临时工。他写的一些英文诗已在刊物上发表。有位外国友人和我说“你丈夫的诗写得非常好，他会成为大诗人”。

芝大有一个国际公寓，各国留学生都住在那儿，我也曾在那儿住过。婚后，我们虽然住私人公寓，周末仍常去参加舞会，打桥牌。许多中国同学去那儿聊天。良铮总是和一些同学在回国问题上争论。有些同学认为他是共产党员。我说如果真是共产党员，他就不这么直率了。我总劝他不要这么激动。他说作为中国人要有爱国心，民族自尊心。当时学生中各种思想都有，最多的是观望派。一些朋友劝我们看一看。当时我已经工作。良铮的二哥良钊为我们安排去印度德里大学教书。美国南部一些

州的大学经常去芝大聘请教授,如果我们去南方一些大学教书,很容易。良铮不找任何工作,一心要回国。

我们婚后,良铮就准备回国,动员我不必读了,回去算了。我不同意,甚至说“你要回去先走,我读完学位就回去”。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允许读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回国,文科不限制。良铮为了让我和他一同回国,找了律师,还请我的指导教师写证明信,证明我所学与国防无关。在1950年就开始办理回国手续。良铮的意思,是我拿了学位就立刻回国。可是美国移民局一直没有批准,直到1952年才批准回香港。实际上香港只允许我们过境,当我们坐的邮轮到达香港附近,我们这几位回大陆的旅客就被中国旅行社用小船把我们送到九龙火车站附近,上岸后就有香港警察押送到九龙车站。在车站检查很严,然后关在车站的一间小屋里,门口有警察,不准出屋,停留了几小时,由香港警察押送上火车。火车开了一小段,又都下车,因这段车轨不相接,走了一小段,再上火车,在深圳停留了一天,等待审查。然后去广州,住在留学人员招待所,填写了各种表格,住了一周审查完毕,才离开广州。

我们从广州去了上海,因为我是姑母抚养长大的。姑母住在上海。我们见到良铮的好友肖珊同志,当她知道良铮有很好的俄文基础后,建议他多搞翻译,介绍俄国文学给中国读者。回到北方后,在分配到南开大学以前,良铮基本上住在北京家中,日以继夜翻译季摩菲耶夫著的《文学原理》。1953年5月分配到南大外文系,除了完成教学任务,业余时间仍搞翻译。

良铮工作勤奋,不仅教学工作得到学生的好评,而且很快翻

译出版了《文学原理》、《波尔塔瓦》、《青铜骑士》等,这引起一些人的嫉恨。当时他和另一位副教授为了挽留解放前倡建南大外文系的老教授陈某,还曾发起召开过一次挽留这位教授的座谈会。1954年,正值李希凡、蓝翎等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南大中文系和外文系共同召开的《红楼梦》批判会上,良铮刚发言,只说了一句话,就被召集人阻止,良铮立刻离开了会场,在场的另一位教授说,这样做不对,要让大家把话说完。当场召集人却大发雷霆。这就是所谓“外文系事件”。没有料到这竟成了良铮后来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依据之一。

1955年肃反运动,良铮是肃反对象,我也不能参加系里肃反会议,后来才听说本来打算把我列为肃反对象,可是历史上实在找不到任何借口,只好让我在家里“帮助”良铮。他每天上午八时就到外文系交待问题,中午回家饭吃不下,晚上觉也睡不着,苦思苦想。我劝他有什么事都说了吧,问题交待清楚也就没事了。领导说他不老实,连国民党党员身份都不肯交待。实际上他真不是国民党党员。他当英文翻译时,杜聿明、罗又伦两位将军经常和他谈论文学、诗歌,非常喜欢他写的诗,有时让他读诗。良铮非常苦恼没有可交待的,可是又被逼着交待。1956年,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予以结论,我们也都放心了。

1956年“大鸣大放”期间,《人民日报》副刊主编袁水拍向良铮约稿。他写了《九十九家争鸣记》发表在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后来这首诗被批判为“毒草”、“向党进攻”,也被作为定罪的依据之一。1958年,突然收到法院判决书,良铮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良铮拿到判决书,过了两天,先去告诉我父亲周叔弢,然后把我叫到父亲家才告诉我。判决书上写着如不服此判,可上诉。和家人商量,认为这种判决上诉无门,不可能胜诉,只能逆来顺受。当时许多青年学生被定为右派,下放农村

劳改，良铮虽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机关管制三年，每月发生生活费 60 元，但仍和家人住在一起。他从不抱怨，只是沉默寡言，自己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而不外露。从此我们家没有亲朋登门，过着孤寂的生活。所谓“监督劳动”，就是扫地，图书馆楼道和厕所每天至少打扫两次，原有的工人监督他劳动。晚间回家写思想汇报，认罪反省，每周去南大保卫处汇报思想，每逢节假日被集中到保卫处写思想汇报。1962 年初，虽然解除管制，但每逢“五一”、“十一”节假日，他要去图书馆写检查。他受管制三年，没有告诉他父母，他们一直不知道。春节期间他不能带孩子去北京拜年，只能推说忙，把二老接来天津。他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后，我和孩子们经常受到歧视。有一次，英传回来说，学校不让他当少先队大队长了。孩子很伤心，他一言不发。有时过去的熟人见到我低头过去，假装没看见，我很生气，他反而劝我不要太认真，事情总会过去的。自从 1959 年被管制，直到以后的年代里，良铮很少和亲友来往，连信也不写，他主动不和几位好友如肖珊、杜运燮等去信，怕给人家找麻烦。晚间孩子们经常闹着讲故事，他给孩子们讲“西游记”、“三国演义”等，讲到高兴时，和孩子们开怀大笑。因此，我经常鼓励他和孩子们玩。有时周日去我父亲家，他总和父亲谈文学，也给侄辈们讲故事。孩子们最爱听他讲故事。

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每天上下午南大附中附小的红卫兵都来家“破四旧”。书籍、手稿、一些家庭生活用品，被褥、衣服等都当“四旧”被拉走。当时我们住南大东村平房，大门一星期未关，每天家里地上都有乱七八糟一大堆杂物。孩子们常从乱物中拣一些书、手稿和日用品等。家具被砸烂，沙发布用剪刀剪开。这时良铮已被集中劳改，每晚回家，看见满屋贴着“砸烂反革命分子×××狗头”，一言不发，有时默默地整理被掷在

地上的书和稿件。

1968年,我们家的住房被抢占,我们的家具、被褥和日用品全部被掷在后门外,放在露天下一整天,无人过问。当时学校很乱,一切机构都不起作用,直到天黑了,我们一家六口人仍无处可去。我只好去八里台找了两辆平板三轮车,把堆在露天下的物品,运到13宿舍门口。非常感谢两位三轮车老师傅为我们解了忧。然后良铮和“牛鬼蛇神”们把物品搬到13宿舍3楼。从此我们一家六口人被扫地出门,搬到一间仅十七平方米,朝西的房间。这间住房我们住了五年。许多物品,沙发、书籍都放在楼道和厕所里。屋里放了两张床和一个书桌。这张桌子又是切菜做饭的地方,又是饭桌和书桌。每天等大家吃完饭,良铮把桌上的杂物整理到一边,就在桌子一角开始工作到深夜。不久清理阶级队伍,良铮被集中,我被关押在生物系教学楼。剩下四个孩子,不仅自己做饭,还要给我送饭。一次小瑗(仅十一岁)由于做饭劳累,晕倒在公用厕所,不省人事。后来邻居去厕所才发现,抬回房间,也仅给她喝了一杯糖水。

1970年林彪“一号通令”下达,南大所有“牛鬼蛇神”连同子女一律下放农村。我带着四个孩子到河北省完县一村庄,良铮单独去另一村庄,相距几十里,基本上不通音信。不久中小学开学,四个孩子回天津了,良铮和我仍各自留在完县劳改。有一天,大致快过春节,天气很冷,良铮忽然来看我,我说自从从完县以来没有收到孩子们的信,也没有他的消息,我见到他,控制不住眼泪。他看着我,劝我说“收到孩子们的信,都很好”,还说“事情总会过去的,要耐心,不要惦着孩子”。他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几个月没见面,他又黄又瘦,精神疲乏,他只是安慰我“要忍耐,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他还负疚地一遍又一遍说:“我是罪魁祸首,不是因为我,一家人不会这样。”